

蒋介石亲自检举、查封的书

说南宋

刘鄂公 著
刘永宁 整理



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

说 南 宋

刘鄂公 著

刘永宁 整理

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 数据)

说南宋/刘鄂公著; (美) 刘永宁整理. —北京:
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, 2014. 7

ISBN 978 - 7 - 5000 - 9395 - 4

I. ①说… II. ①刘…②刘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研究—南宋 IV. ①K245. 0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51525 号

策 划 人 郭银星

责任编辑 陈 光

责任印制 魏 婷

封面设计 海马书装

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

邮政编码: 100037

电 话 010 - 88390093

网 址 <http://www.ecph.com.cn>

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18.25

字 数 190 千字

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00 - 9395 - 4

定 价 36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再版前言

刘永宁

在台湾出版的一本史学丛书，从发行到警总没收、烧毁，牵涉到 20 世纪 60 年代许多政界、文化界大佬，其惊涛骇浪的经过，颇为戏剧化。如果不是近期发觉此书已成为孤本，这段历史将永埋历史云烟中，无人知晓。

这本书名为《说南宋》，出版社是柏杨所主持的平原出版社，发行人是郭衣洞（即柏杨），连载的报纸是《自立晚报》，作者是民社党员，这样的组合，已让执政的国民党很不放心了，何况这本书的书名用“南宋”，这和“偏安”一词常连在一起用，执政当局更是过敏。故在台湾销售很短的时间后，即马上被举发，而检举者令人惊讶，因为此人着实大咖，即当时国民党政府头号人物——蒋介石。

“终日彷徨，不知所止”

蒋介石在 1965 年 6 月 23 日的日记是这么写的：

上午主持中央常会，对中央委员之精神与态度极为消沉，提起选举失败（去年）问题当时各主管不负责任之情形，又想到《说南宋》一书出版，我中央并无人认此事之严重，而待我亲自发觉，一般委员

仍以为常，乃不胜愤慨，痛斥中央委员之麻木不仁，殊为痛心，因之终日彷徨，不知所止。

到6月27日又在“星期预定工作课目”中再提：

……与最近出版的《说南宋》的反动书籍，而中央常委无人注意与不负责之态度，引起痛愤而怒责常委，虽自问不为太过，而发怒痛责同志殊失常态时，用（实）愧疚修养仍无进步也，应切戒之。

同时从当时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阮毅成先生所记录的《中央工作日记》中，也分别在6月23日、26日，记录此案，并详细记下蒋言时“痛心疾首，眼含泪光，右手击拍讲桌，声色俱厉，此为年来所少见者”。

由于他老人家“非常震怒”，亲自披挂上阵，党政军三方集体动员，许多当时政坛重量级人物如张群、黄伯度、蒋经国、陶希圣、谷凤翔、谢冠生、秦孝仪、张其昀、谢然之、许文渊、陈建中、李白虹、阮毅成、陈大庆、邓定远、孙亚夫、蒋匀田、何成濬、傅良居、李玉阶、吴三连、许金德、翁明昌、叶明勋等等，都在这“《说南宋》事件”中，有的成执行命令者，有的是协调者，直接或间接地都受关联。最惨的应是曾在救国团任职过文艺组副组长的柏杨，他是这本书的出版商，并为发行人，加上他又因《西窗随笔》、《大力水手》等文章及漫画，由警备总部送到景美军人监狱及绿岛，服刑近十年。

《说南宋》的刘鄂公

反观《说南宋》的作者刘鄂公，在整个事件中原本是蒋

介石坚持要严办的“共匪同路人”，却在惊涛骇浪中侥幸脱身，有惊无险，其中过程非常诡异，十分曲折。感谢国民党内有一批开明之士，用“太极内功”和蒋介石过招，打了个平分秋色，蒋介石虽非常不心甘情愿，但为“反攻大陆”，在民主政治的大旗之下，把这一文字狱作了很大的修正：“书籍全部没收烧毁，作者严加警告，发行人另议。”

刘鄂公为家父刘家麟的笔名，毕业于武汉高等师范，早年在湖北省是新闻从业人员，于民国十三年创办《汉报》，抗战期间在陈诚主政湖北时曾派嘉鱼县长，但他拒绝就任，反加入中国国家社会党，这种经历和他那自由派文人的性格是十分吻合的。他私下曾说：有风格的文人一定要适度向权威挑战，一方面让当政者享受宽容美誉，另方面也表现言论自由，这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一部分，否则将来历史是要背骂名的。

他这一生受民社党主席张君勱先生之影响很大，而张本人一直对蒋介石很有意见，先君必然也是一脉相传，但有一事却是和蒋介石站在一条阵线上的。我在他仙逝后的文札中，发现先君和张君勱一段有趣的对话，时间是1948年12月，地点是上海。那时徐蚌会战刚结束，国府军事惨败，先君问张君勱当时千万人都想知道的问题：“留还是走？”张的回答非常有水平：“在日本人治下做顺民和在共产党治下不同，这不是两个党（共产党、国民党）的斗争，而是两个主义（共产主义、资本主义）的斗争，时间会拖得很长……”于是我们全家六口，靠二两黄金，千辛万苦从汉口经湘、贵、黔、粤来到台湾，和蒋介石一同“共赴国难”。（由于逃难中，缝在鞋内的黄金，又被鞋匠吞了一两，没有缝进去，事后才发觉，穷困之际，本节风沐雨，遇匪遭劫，恐怖回忆太多，以致来台以后，非常期望儿女出国。）

由于没有什么人事背景，更为“花瓶党”中一株闲草，

故只能操自己的本行，煮字疗饥，卖文为生。我从小印象，就见他戴深度眼镜，以超乎常人的距离，低首（非常低）伏案写稿，每日如此，如今回忆，自叹不如。

先君有很多文章是在《自由谈》刊登的。非常惭愧，我保留的很少，连《自由谈》为他出版的《旅台心声》也已无从寻获，所幸《开国与首义》、《中国名女人别传》尚存数本，但其沥尽心血的《说南宋》则被警总会同北县新店分局全部没收烧毁，荡然无存，如今还能发现的孤本，实乃不幸中之大幸（详见后文）。

《自立晚报》连载

先君是在1964年11月应《自立晚报》董事长李玉阶之邀，开始在该报副刊连载《说南宋》的。在写此书之前，是否真如蒋介石所言之“别具用心”呢？我想是有点，因为如今阅读他的自序，就已觉得是在老虎口中拔牙了：

南宋遭靖康之难，偏安江左，历一百五十一年，得君八九（实为八帝一王），其间名将贤相辈出，慷慨悲歌忠义有为之士，尤不乏其人，当时所凭借者，奚啻十倍于夏少康、越勾践？但自播迁临安以后，从庙堂以至于山林，凭恃两河天险，一隅自安，粉饰太平，不独未能北定中原，扫穴犁庭，且因人谋不臧，终致君臣流亡，浮尸海上。所谓中兴难，偏安尤难。史实明显，真理昭然，揆诸因果律，丝毫不爽。

另言“了解南宋未能复国，驯致遭到灭亡的原因：是猜忌、自私、苟安、畏战、宴安鸩毒、因循偷安”。

这样的内容，稍有历史了解之士，很自然地会“对号入

座”，必有借古讽今的念头。虽全文十二万字，在《自立晚报》连载完结，并出书销售，但终究逃不过蒋介石的眼睛，在“反攻大陆”之“国策”下，只要一提“偏安”，全身神经就绷紧了，这种“偏安症候群”，以他个人最为严重。

先君在世时曾把“《说南宋》事件”，透露部分于我们兄弟两人，尤把古道热肠且公然在蒋介石面前仗义直言的黄伯度、几近抗命的谢然之诸公之风仪，告诉我们应永为感恩缅怀。又1981年柏杨和夫人张香华女士来到美国旧金山，我当面请益，更为重要的是中政会副秘书长阮毅成世伯的《中央工作日记》，透露了当时很多讯息，这才发觉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幕。

蒋介石亲自检举

“《说南宋》事件”之爆发，是该文经《自立晚报》连载后，在5月由平原出版社出单行本，为推广销路，先君在《中央日报》头版右下角登一则小广告：“刘鄂公所著《说南宋》已成书出版，邮政划拨账号二六二六号，敬请读者订购。”非常凑巧，被有读报习惯的蒋介石看到，再一细问，已在《自立晚报》登载五个多月，当时就叫读报的秦孝仪去买了一本。当他看到南宋朝廷人谋不臧，用挂皇旗的“粪船”走私，就把书猛丢于地，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但他控制怒气，隐忍不发，看看有无同志挺身检举。但事隔十余日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最后只有自己挺身而出，在三军联合参谋大学毕业典礼中，先训了一段话后，话题一转，随即指出：最近市面上出版一本《说南宋》，这本书我已仔细看过，是叙述南宋偏安杭州的历史，影射我偏安，竟把杭州作汴州，醉生梦死，不想复国，不想反攻大陆。随即蒋介石声色俱厉地说：“主管文化宣传的机构，一定要严查。”但这天的毕业典礼都是和军方有关之大

员，主管文宣的党政人员只有中央党部秘书长谷凤翔在场，于是赶紧通知中四组主任谢然之，但十天后只接到报告，而无具体行动，他才于6月23日中常会上发了脾气，几近失态。

描写最深入的，是阮毅成先生的《中央工作日记》。蒋先生说：“我自己检举的《自立晚报》所载《说南宋》，第四组竟说《说南宋》作者系国大代表属民社党籍之刘家麟，即算了事。该文在该报连载五个多月，单行版出版，刊载广告经一两天即初版售光。我不是重视此书，而系重视此书之背景，以南宋影射今日台湾充满失败主义，若非有共产党在幕后指使，腐蚀我人心，必不至此。第四组主管宣传，每日看报，竟未注意，如此何能做中央委员，何能做宣传主管，如不能尽责，则辞职可也（以手击案）。”

这次中常会后，第四组（今之文委会）主任谢然之等于被视为不负责任的主管，故蒋介石指示第六组（大陆工作会）副主任李白虹襄助处理，这不但是要主管“匪情”的中六组去“调查刘某背景”，同时表明对中四组谢然之的消极态度已不能忍耐了。

狂风暴雨来临

面对此狂风暴雨，先君知道情况严重，但不知蒋介石已把他列入“为匪作伥”的反动派，直到郭衣洞被捕、李玉阶及其子李子弋都被谈话后，才知此事已和蒋介石有关，祸闯大了。于是先找自己的同志，即民社党的成员，如孙亚夫（民社党主席之一）、蒋匀田（民社党中常委）等人去商量如何转危为安。蒋匀田不愧张君劭弟子，马上祭出：民国三十七年的宪法是三党联合签署的，民社党当时是坚决脱离民盟和国民党站在一起，才能顺利召开国民大会的，所以应找国民党中政会反映。

接着下先君又和旅台湖北籍各界人士联络，向张知本、何成濬、陶希圣、邓定远、黄一鸣、杨肃尹（国大代表）一一请益。就在这时，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阮毅成辗转给先君传来消息，希望他不要串联，凡事都要低调，有机会必亲告内幕。接着陶希圣也来消息，愿先君静观待变。这样一来，这突来的巨变似乎有了转机。

但到了7月底的一个星期一，中四组和中六组两单位各派人员，会同警总徐姓中校和北县新店分局两警员，到新店大坪林住处，展示警总没收所有《说南宋》的文件，并要求开出赠书名单，将存放于家中之五十捆书一千余本全部运走。因为确点册数，捆扎二十本一叠的草绳都被剪开，当我赶回家，满地都是草绳，情状凄凉。记得先君开始告诫我，你私立大学学费将无法支付，可能不能出国了，找工作将有困难，还有每个月要到派出所报到一次，这就是所谓“文字狱”，更麻烦的是中六组也出面，显有“为匪宣传”之嫌，这样一来风浪更大了。

从1965年7月起，先君已不出门，整理赴保安处的衣物，交代后事，他并无文札记下这段悲哀无望的心情，但从其整日无语、面色凝重的样子，当然知道这是暴风雨前夕的寂静。

鸭子划水

其实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张群、黄伯度、谢然之、阮毅成等人，都以鸭子划水的方式，想为此案解套，对蒋介石的指示，希望以拖待变。

首先感谢阮毅成阮伯伯，以他和中六组陈建中主任的交情，严格要求不能“罗织”罪名。找个人来作伪证在中国历史上太常见了，近年的孙立人案、任显群案不能重演。这个太重要，先君因而可以较容易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再来阮毅成是负

责和青、民两党协调的中政会副秘书长，他当即陈报中央党部秘书长谷凤翔。民社党对“《说南宋》案”反应极大，孙亚夫、蒋匀田也都有书面陈情，直上层峰。

在26日的常会中，阮公还记录：

张其昀发言甚长，且极为气愤，要点：思想文艺，均需要斗争，封报馆，捕作者，乃军阀作风，绝不是办法。1961年，本人提议拨一百万元，奖励同志中有关叙述开国史实之文艺作品，当蒙总裁首肯，结果是款虽照拨，却为第四组转作印刷《开国文献》之用，并未对党中文艺作者，有任何支助。（按《开国文献》之编印系由陶希圣主持，而当天常会，蒋介石未参加，也是陶公为主席。）

张其昀的这番发言，蒋事后一定看到。谁是“军阀”？大家都心知肚明，蒋介石当然有些顾忌了。

最难能可贵的是阮先生透过我们的湖北同乡、国大代表黄一鸣，代传整个事件的大小进展，这让先君能安其心，静待其变。果然不到十天，中六组已查报清楚，刘家麟和《自立晚报》发行人李玉阶（和阮毅成有亲戚关系）无任何与“匪”有交往之嫌。

谢然之的四招

在《说南宋》一开始，蒋是交待中央党部秘书长谷凤翔命令中四组，查实以报，准备办人。和先君交情颇深的四组主任谢然之谢伯伯，是以“拖”字诀，希望蒋介石先冷静下来，然后再把事件缩小打击面，并想了很久，作了一个很技巧的报告，经秦孝仪之手直接陈报蒋介石，不希望太多人知道，以免

节外生枝（连直接受命者秘书长谷凤翔都没看到报告）。这手法蒋不会不清楚，所以不但在6月23日星期三的常会中再度发难，还拉中六组合办。（谢请病假未出席那次常会，由副主任许文渊代。）

到6月26日星期六的常会，谢然之只有列席（蒋未出席，陶希圣为主席）并专题报告五十分钟，全系有关《说南宋》的事，全文见阮毅成《中央工作日记》（《传记文学》连载）。简以述之，第一是，四组是幕后策动单位，执行是警总、教育部、新闻局，职权分散且重复。

次之，《说南宋》书出版单行本，经由“内政部出版事业管理处”，研究无法依“出版法”取缔，现不得已由警总依戒严法予以没收。

第三，《自立晚报》已由吴三连、许金德、翁明昌出资入股，并由叶明勋任发行人，但自《说南宋》事件后，叶自动辞职，如何对待《自立晚报》，政府应拿出决心，四组只能执行中央决策，不能替中央作决策。

第四，除《自立晚报》外，有齐世英办的《时与潮》，友党的《民主潮》，本党同志刘某所办之《人间世》，以及由香港进口之侨报、侨刊，其有毒素思想者尚多，请中央决定是否一并取缔。

谢然之这四点，处处拿到要点，但却大异蒋介石之本意，更让蒋不表赞同的是他签结的意见：“书籍全部没收烧毁，作者严加警告，发行人另议。”

惊心动魄的谈话

蒋介石突然发觉，这刘家麟是何方人物？为什么有人为他缓颊？为什么使不出劲？虽然他想办人，但却没有人愿下手，于是有一天和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及副秘书长黄伯度特别谈起

《说南宋》。真是老天有眼，无巧不成书，先君和这两位大老都有旧：岳公是在民国二十四年主政湖北时就有旧谊，而黄伯度公早年追随前驻日大使许静仁（世英）任大使馆一秘，中日因卢沟桥事变而断交，下旗返国，为赈济委员会委员。抗战时之赈济会，实际是抗日地下组织，先君在抗战时期，一直在该会参加许多救亡抗日的工作，两人交往很有一段时间。

那天的谈话，只有蒋、张、黄三人，事后黄伯公和家父谈起经过，真是步步玄机，句句惊心。当然是蒋先提起，刘家麟是何许人也？其实他已从蒋经国那里得知情况，而小蒋是从彭明熙（孟缉，当时已发表为“大使”，即将就任，湖北籍）、邓超平（定远，国大代表召集人，湖北籍）处知道的。蒋现在想问自己身边的两个智囊，刘某后台到底是谁？张群是秘书长，他先回答，很简单，也很小心：“刘某是友党的国大代表，是个偏爱历史的书呆子。”然后整室沉静下来，蒋看地板，张、黄两人也默然。突然蒋介石厉声说：“民社党的国代就可以写此一摧毁民心士气的书吗？”显然蒋的火气未消，但至少不视先君为“匪的同路人”了，黄伯公这才有机会让插上话：“总统，查办友党国代，有违当年三党联合签署宪法的民主精神，对社会的观感要考虑。”讲到这里，蒋突举右手制止，说：“我知道！”

下面这段是黄伯老向先君形容：“老先生在办人前必手搔头顶，大概在生理学上，下狠心决定，头皮必充血发麻，但那天一直没有抓头皮。”所以黄伯公用上他最深思熟虑的一招：“总统，当下正值我们反攻大陆的前夕，尤其今年是关键的一年，需要民、青两党协助之处正多，和为贵吧！”这话蒋介石大概听进去了，他在室内来回走动，黄伯公仔细观察他还是没抓头皮，于是大胆提议：“先生，就照中四组的方式签结吧！”蒋又想了一会儿，突以手拍椅背，只应一声“好吧”，

然后坐回他的元首椅，张、黄便自动离去。先君的这个“《说南宋》案”就这样，一拍进关，二拍过关，侥幸与监狱擦身而过。

当消息由黄伯老告之先君时，他曾问柏杨是否一同签结？黄伯老则非常慎重告诫先君，千万不能过问：“你一个人的事，已惊动二三十人，费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有今天这个结果，如再节外生枝，前面众人之力，必全功尽弃。”果然柏杨没有包括在这协议中，在六个月后被警总逮捕，送进景美军人监狱，后并送绿岛管训，前后近十年。

孤本由阮毅公保存

渡过惊涛骇浪之后，先君最遗憾的是没有留下一本《说南宋》，由母亲偷偷藏下的也不全。一直到2003年，我的知交阮大仁兄，居然在其父阮毅成的遗物中发现一本。此书是先君在出单行本的第一天赠送给他的，上面并题款：“毅成先生教正，鄂公刘家麟赠，五十四年六月。”

原来阮伯伯仙逝后，因为来的突然，留下书很多，其子阮大仁兄决定将有关法律书籍赠政大，其他赠送世新，因为阮伯伯身前任教于这两所大学。后来世新发现有标明“极机密”之卷宗，不愿开启，请大仁兄取回，而《说南宋》这本书则收藏在卷宗内。真感谢大仁兄的情意，因为他早从我这里知道全案的始末，特地把此书从台北带回美国，亲赠于我。先君在天之灵，因而得以慰藉，此孤本能重见天日，阮家父子两代确实大恩于刘氏“天藜堂”。

偏安的本质

现在回顾以往，先君能够有惊无险，侥幸未掉进“白色恐怖”黑洞，并非有何后台，只不过有两个层面的因素，影

响到此案的发展。

其一是整个案子，因柏杨入狱已闹得沸沸腾腾，如再加上一个友党的国大代表，不但对整个党政协调有困难，并对国际观瞻有一定程度的损害。张群、谢然之、阮毅成、黄伯度诸公，虽在当时是违背蒋介石的意思从事，但想得比较冷静，如今等于替老蒋补过，使他在后来的历史上，还有转圜之余地，此为净臣也。

其二是“反攻大陆”这个“国策”，在当时是件“国王的新衣”，很多明智之士虽然已经看出无望，却都不愿意拆穿。但每年用百分之六十五的税入从事国防预算，置“建设台湾”于何处？尤对稍微讲点真话、讲究务实的人士，不但不假颜色，还动不动就扣上“失败主义”、“为匪宣传”的大帽子，这当然令很多人心中不服，此时《说南宋》出现于世，是不是有人借力使力呢？这不得不令人越发怀疑了。

我认为蒋介石对“南宋偏安”其实是一知半解，南宋的偏安和台湾的偏安在本质上完全不同。南宋的偏安，第一是局部性，在开始时并没有外国集团势力介入，更无主义的斗争，这盘棋南宋的赵构自己可以下，并不受制于人；第二是地理上只有江淮两河在宋金之间，两边都可南进或北伐；第三是宋室南渡之时民气可用，岳飞、韩世忠、吴玠、吴玠都是抗金之名将，岳飞之北伐有很大的机会成功，但南宋朝廷却以议和为国策，民间热，朝廷冷，所以历史对南宋偏安，不顺从民心，是给予负面评价的。

反看台湾的偏安，首先已有外国集团势力在主导了。美、苏两国形成两大集团在斗争，并在意识形态上各自为资本与共产两主义，争得你死我活。蒋介石的“国府”虽不是这个大棋盘中的马前卒，但也是棋局中一枚重要的棋子，可是蒋先生不能像赵构一样，自己下这盘棋。

其次地理上有台湾海峡在中间，国共两方很难东进西攻，

偏安是很自然形成的。最重要的是两边的民气都没有形成，“国府”这边，因地窄力弱，无论经济实力、国防军备，只能算“小国家”，若无美国支持，反攻大陆当然是空谈，反攻意志当然消沉，这种民间冷、政府热的现象，正好和南宋相反。故我可以大胆地认定：南宋偏安是错的，而台湾偏安应该是对的，时隔多年后，今天台湾的状况，不就已经证明了吗！

如果这本《说南宋》是在现在发行，以当今“千家齐奏，百家争鸣”的台湾社会，先君绝不会有麻烦的，尤其现在已从“反攻大陆”转成“两岸和平”的新局面，南宋偏安，已不再敏感了，“偏安”其实已代替“国策”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及“文化小革命”

就在《说南宋》被查封的这一年，中共“文化大革命”已蓄势待发，而导火线也是一本书，即吴晗的《海瑞罢官》（其实是剧本），使大陆的知识分子面临一场浩劫，十一年后才告结束。

非常凑巧，台湾这时也因为这本《说南宋》，而面临文化震荡，再往前走一步，就成“文化小革命”了。本来蒋介石亲自揭发此案的初期，是以雷霆万钧之势准备严办的，而掌管意识形态的中央第四组，是可以迎奉层峰，扩大案情（以前也有成例发生，如雷震案、《文星》杂志案等），到底还是有知识分子的良知，中四组并没有这么做，因为他们不是大陆的“四人帮”。在蒋介石身旁的重臣，如张群、黄伯度两公，刚好尽全力缩小损害，化“严办”为“微惩”。先君躲过了牢狱之灾（柏杨则因数罪齐发成为唯一的牺牲品），台湾的知识分子也因而受惠，如若此案往坏的方向发展，台湾的文化界、知识界，必定会窒息很久，那和中共当时的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差距就没那么大了。

检阅引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吴晗，他的下场真是可怜。这样比起来，先君的遭遇，真不算什么，尚属幸运了。